

現代世界史

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保加利亞

蘇聯 Л·И·祖波克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一九五四年 北京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時期的保加利亞

П. И. 祖波克

保加利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

保加利亞是站在同盟國方面參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還在大戰時期國內就已展開了革命高潮，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之下，這一高潮受到了特別強大的推動力量。戰爭將結束時，保加利亞已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武裝佔領了保加利亞的德軍把全部存糧都運走了。無論後方或前綫，都日益增長着不滿的情緒。勞動人民爲保王菲遜南和資產階級各政黨的政策所激怒，爲新起的百萬富翁、投機家和貪賍賣法的政客的專橫恣肆所激怒。所有舊的政黨，包括社會民主黨的『廣大派』（保加利亞的孟什維克）在內，都破產了。斯丹波里斯基所領導的農民同盟和『緊密派』社會民主黨的影響，日趨增長；除了工人以外，知識分子、公務人員、教師和鐵路員工的廣大階層都相率參加『緊密派』。保加利亞的緊密派分子戰時在後方和前綫的革命工作，取得了積極性的效果。厭戰的兵士要求立即媾和。在多瑙河，保加利亞的兵士和俄國革命兵士開始實行聯歡；在薩羅尼加戰綫上，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及法國兵士之間，也開始實行聯歡。

後方不斷發生飢餓的軍屬的羣衆性示威遊行。保王菲遜南和拉多斯拉沃夫政府的政策完全破產

了。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成立了以馬立諾夫爲首的民主黨和激進民主黨政府。這個政府提出鞏固前綫作爲自己當前任務。它求助於兵士的愛國主義精神，勸他們再堅持一個時期，可是厭戰的兵士，對於鼓吹繼續進行帝國主義的屠殺的言論，連聽都不願聽；他們要求媾和。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馬其頓戰綫被突破，絕大部分兵士被俘。大批兵士離開前綫，返回故鄉，他們搗毀了康斯坦迪爾的司令部，並佔領了拉多米爾城。

爲增長起來的羣衆運動所嚇倒的保王菲遜南，釋放了農民同盟的領袖斯丹波里斯基；他是一九一五年因發表反對戰爭和菲遜南的言論而被捕入獄的。可是，斯丹波里斯基及其助手達斯加洛夫不僅沒有去作調停人，反而參加了兵士的運動；他們宣佈要推翻菲遜南，建立共和國，並開始向索菲亞進軍。但是，政府藉助於德軍和保國軍官隊的力量，經過兩個星期的戰鬥，終於在索菲亞附近的福拉達擊潰了起義者。政府在本國兵士進攻索菲亞的威脅下，趕忙與協約國簽訂了停戰協定（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菲遜南遜位，其子波利斯第三承繼了王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和保加利亞在前綫的失敗，使戰時已經開始的危機加深並尖銳化了。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中，保加利亞人民死亡達十五萬人，負傷者達二十萬人。戰事結束時，國家已破壞不堪，精疲力竭。農業極其凋零，地方工業也遭受破壞。貿易的入超額急劇增大。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協約國與保加利亞在涅依簽訂了和約。根據和約，保加利亞又喪失了不久以前從羅馬尼亞手中奪取來的多不魯甲南部；馬其頓割讓給了南斯拉夫；擁有富饒的植菸農場的色雷斯西部割給了希臘。使保加利亞受到特別嚴重的影響的是：地台加至港割給了希臘，從此保加利

亞就與愛琴海隔絕了。保加利亞喪失了根據普遍兵役制原則建立陸軍的權利。根據條約，保加利亞只能有包括軍官和非戰鬥人員在內的兩萬人的僱傭軍隊。

除戰前和戰時的巨額債務外，和約又以二十二億五千萬金法郎的賠款——等於保加利亞國家財富總額的四分之一——加諸保加利亞。此外，保加利亞還必須担负協約國各種委員會的經費，必須供應各種商品，並予戰勝國以最惠國的權利。到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爲止，保加利亞供給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希臘一百一十八輛火車頭、二千零四十九輛車廂、二千三百噸鐵路設備，等等。

國內爆發了異常深刻的危機。貿易入超額一年比一年多，一九一九年入超達四億一千一百萬里佛，一九二〇年達六億里佛，一九二一年達九億二千四百萬里佛。一九一九年國家預算的赤字達六億二千九百萬里佛。通貨迅速地膨脹起來，國內展開了空前的投機活動。絕大多數工人失去了工作。貧困現象加深了，人民羣衆遭受着飢餓。外國資本家利用國內的困難狀況來賤價收買企業，劫掠國家，把保加利亞變成爲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半殖民地。

有社會民主黨人參加的聯合政府

爲革命運動的規模所嚇倒的資產階級，決定求助於農民同盟和改良主義者（社會民主黨的『廣大派』）。停戰協定簽訂後，成立了有社會民主黨人和農民同盟盟員參加的托多羅夫的聯合政府（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社會民主黨人領導內政部和勞動部。

這時，國內的革命浪潮仍在繼續增長。緊密派領導着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行動。緊密派進行的爭取大赦政治犯的運動，遍及到全國。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政府不得已而實行大赦，並中止了一切政治案件的審訊。

一九一五年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五個黨員的緊密派，到了一九一九年末就擴大到三萬五千四百三十五個黨員了。組織在職工會中的工人達到三萬五千人。

緊密派學習了俄國無產階級的經驗，修改了自己的黨綱，把發動武裝起義、推翻現存制度的口號加進黨綱。它展開了要求遣返戰俘，審判戰犯，沒收戰犯和投機家財產的運動，堅決維護蘇維埃俄國，並在軍隊中展開了革命工作。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緊密派召開了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它決定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當時並通過了保加利亞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

一九一九年八月間舉行了戰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政府不得已取消了國內的戰時狀態，並允許在更廣泛的政治自由的條件下進行競選運動。競選運動和選舉的結果證明，廣大的人民羣衆反對把國家引向崩潰的保加利亞資產階級的政策。在各地舉行的大會上，只有共產黨和農民同盟的演說者能够發表演說，人們或是乾脆不准、或是阻止資產階級各政黨代表的發言。

選舉產生了這樣的結果：農民同盟取得十八萬選票和八十五個議席，共產黨取得十一萬八千選票和四十七個議席；資產階級各政黨都失敗了。

斯丹波里斯基政府

選舉結束後，成立了斯丹波里斯基的第一任政府（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七日）。在農民羣衆中擁有極大影響的農民同盟、害怕國內革命的發展，竟與各資產階級政黨結成聯盟。斯丹波里斯基政府網羅了維護大地主、銀行、工業托拉斯的利益的人民黨代表（首領托多羅夫），和代表一部分自由資產階級的進步自由黨的代表。

一九一九年是保加利亞無產階級舉行大規模政治示威和採取革命行動的一年。最重要的各工業部門的工人，都捲入了罷工鬥爭。站在罷工鬥爭的最前列的是鐵路工人；這時共產黨在鐵路工人中間的影響已大爲增長了。同時，許多城市中爆發了反對政府支持鄧尼金的示威遊行。十二月底，運輸工人和郵電員工的罷工演變成爲政治性的總罷工，它延續了整整一星期。在總罷工中，共產黨起了領導的作用。

斯丹波里斯基政府廣泛地利用煽動宣傳，大言不慚地向農民羣衆提出諾言，想盡力阻止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建立統一戰綫。罷工鬥爭時期，它殘酷地鎮壓罷工工人，並予共產黨以沉重的打擊。一九二〇年初，斯丹波里斯基政府，假手於內政部長社會民主黨人帕斯圖霍夫，鎮壓了運輸工人和郵電員工的罷工。一九二〇年春，斯丹波里斯基決定舉行新的選舉。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選舉，證明資產階級各政黨已進一步被削弱。共產黨取得了十八萬選票和五十個議席。農民同盟在國會中僅取得

微不足道多數。

斯丹波里斯基政府一共執政三年。它進行了既反對共產黨人又反對大資產階級的鬥爭。政府施行了准許合作社專營農產品出口業的法令。這是一個在共產黨人支持之下施行的法令，它剝奪了大商業資本家和銀行資本家相當數量的利潤。斯丹波里斯基政府又實行了勞役法和引起大資產階級不滿情緒的累進所得稅法。土地稅和牲畜稅都減輕了。政府採取了反對投機家的許多措施，沒收了屬於大房產主所有的大住宅，並實行了所謂土地改革。國家和教堂的土地以及從大地主手中收購來的超額土地（擁有三十公頃以上土地的人均被視為大地主），組成了國有地。無地的和少地的農民可以用支付償金的方式從國有土地中領取土地，其地價分二十年償清。這種土地改革是沒有重大意義的，因為在保加利亞，大地主佔有的土地的比率並不大。由於實行了這種土地改革，政府從七百一十七個農戶手中沒收了約四萬零六百五十公頃的超額土地，而這些土地則被分配給七萬四千五百九十六個農戶。

資產階級同樣也不滿意斯丹波里斯基政府的外交路線。斯丹波里斯基在對外政策方面，基本上是追隨法國的。當時法國關心於鞏固小協約國，特別是鞏固南斯拉夫，因為這樣才可以加強它在巴爾幹和近東的影響。所以它就對保加利亞施加壓力，促使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接近。這終於使得斯丹波里斯基政府拒絕支持保加利亞境內很得人心的馬其頓運動；它甚至在一九二三年春季還與南斯拉夫締結了共同鎮壓馬其頓運動的尼士協定。

迫害馬其頓組織的行動促進了反對斯丹波里斯基的反對派的發展。

一九二三年三月，斯丹波里斯基爭得了賠款債務的若干『修改』。根據與賠款委員會訂立的新協

定，債務並沒有減少。而不過分成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五億五千萬金法郎，限六十年繳清，外加百分之五的利息；第二部分是十七億五千萬金法郎，免息繳付，並以保加利亞的關稅收入爲担保。

政府的各種措施引起了資產階級的不滿，他們開始準備發動政變。早在一九二〇年末就已成立了以常果夫爲首的秘密組織——『人民協商』。工業資產階級和金融資產階級不惜供給反動組織和白黨組織以大宗錢款。佛蘭格爾匪幫有三萬人逃亡到了保加利亞，他們成了保加利亞反動勢力的堡壘。此外，資產階級又在『憲政聯盟』的名義下發動了一個公開的運動。『憲政聯盟』建立了特殊的軍事組織，並利用不滿意與南斯拉夫接近的政策的一部分馬其頓民族『自治派』組織來跟政府作鬥爭。反動的刊物展開了反對政府及其各種改革的瘋狂運動。

資產階級清楚地意識到，用議會制的方法是不能從斯丹波里斯基政府手中奪得政權的。勞動人民或者是擁護共產黨，或者是擁護農民同盟：城市的工人大多數是跟着共產黨走，而鄉村農民則大多數是跟着農民同盟走。因此，資產階級認定，它的唯一出路就是發動反動的政變。

與反動政變進行殘酷的鬥爭，迫切地要求共產黨與農民同盟靠近，並實行統一戰綫的策略。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共產黨與農民同盟在某種程度上接近起來。這幾年裏充滿了兩個組織共同採取行動來反對資產階級的事實。原先曾進行鬥爭反對共產黨的斯丹波里斯基政府，現在不能不改變它對共產黨人的態度，同時共產黨也改變了原先反對政府的態度。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打擊了資產階級的陰謀家。一九二二年三月，『憲政聯盟』和佛蘭格爾匪徒的陰謀被揭破了。揭破這一陰謀是共產黨的功績，共產黨人和農民在這一時期的共同鬥爭，打亂了陰謀家的各種計劃。政府逮捕了一部分佛蘭

格爾分子，並把他們驅逐出境。

一九二二年九月，『憲政聯盟』在台爾諾夫舉行盟員大會。這是向政府公開挑戰的行動。但是，由於共產黨及時地採取了行動，陰謀分子的計劃又被粉碎了。共產黨發動了廣大羣衆來和反動勢力作鬥爭，並提出了『審判戰犯和陰謀分子』的要求。十一月，政府就這一問題舉行了全民投票，結果有百分之八十的投票人都贊同逮捕戰犯和陰謀分子。戰犯都被逮捕了。由此可見，共產黨和農民同盟之間的暫時聯合，提高了羣衆對反動資產階級的陰謀活動的警惕性。

在羣衆中進行了巨大工作的共產黨，這時着手建立自己的軍事組織，並在軍隊中進行革命的工作。

共產黨要求政府武裝無產階級，可是斯丹波里斯基政府不僅斷然拒絕武裝工人，而且也拒絕武裝農民。它解散了國會，並舉行新選舉。在一九二三年四月舉行的國會大選中，共產黨取得了二十三萬選票。

資產階級所有各政黨取得了將近二十萬選票。農民同盟取得了壓倒多數的選票。這使斯丹波里斯基安心下來，他認定從資產階級方面產生的危險已經過去。

政府認為，沒有共產黨人的支持，它也能站得住腳，於是便集中了主要的火力來反對共產黨人，這引起了共產黨與農民同盟之間的決裂。

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的法西斯政變。九月起義

資產階級利用共產黨與農民同盟之間的分裂狀態，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發動了政變。政變是一度曾任政治經濟學教授和索菲亞大學校長的常果夫領導的。參加政變的，有現役軍官和後備軍官組成的軍人同盟，及其他許多法西斯組織，如下級軍官聯合會、『庫布拉特』、『保衛祖國』組織、佛蘭格爾匪徒的組織以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馬其頓組織等。而起領導作用的則是爲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所支持的『人民協商』這個組織。加入『人民協商』的社會民主黨的一個領袖卡查索夫，在政變結束後做了常果夫政府裏的部長。斯丹波里斯基政府猝不及防地被佔領了。它沒有把人民羣衆武裝起來。斯丹波里斯基本人在叛亂初起時也被殺害了。可是全國各地仍然爆發了反對反革命資產階級的起義。共產黨的領導機構這時却犯了極重大的錯誤：它沒有與農民同盟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反革命分子。共產黨的領導機構錯誤地把六月九日的政變看做是城市的與鄉村的兩個資產階級集團之間的鬥爭，而宣佈自己守『中立』。所有這些情況就有利於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和法西斯勢力取得勝利。

在說明促使保加利亞共產黨於一九二三年六月間拒絕維護『農民同盟』的原因時，柯拉羅夫說道：

『這首先是因為我們被農民政府在一九二三年選舉中取得的重大勝利衝昏了頭腦。

這次選舉結束後，不論是政府本身也好，不論是共產黨也好，都認爲國內是不可能立即爆發政變

的。因此，第一，我們不相信有發生政變的可能這種心理起了作用。第二，農民政府對工人和共產黨人採取顯然敵對的立場這種情況，在黨內產生了深刻的印象，這當然也有重大的意義。一九二三年選舉時期，農民政府向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發動了進攻。由於農民同盟採取了這樣的政策，因而我們感到農民同盟的政府與資產階級政府毫無差別，並且應當像反對資產階級政黨一樣，進行反對這個政府的鬥爭。』(二)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譴責了保加利亞共產黨的錯誤，並幫助它改正了自己的路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向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指示說（六月十四日），『就現有的材料，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當前的局勢要求你們甚至與斯丹波里斯基共同採取堅決的行動；否則，目前執政的政府就會鞏固起來，共產黨人將被消滅。要周密地考慮一下當前嚴重的局勢，要記着科爾尼洛夫叛亂時期布爾什維克所採取的策略，毫不遲疑地行動起來』。

當果夫政府在粉碎了農民同盟以後，立即就來打擊共產黨和革命工人。職工會、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合作社、工人報刊、工人俱樂部均遭破壞。政府在全國各地大肆捕人。共產黨的積極分子中被捕的就有二千人以上。保加利亞社會民主黨的孟什維克領袖竟多方協助政府去實行所有這些殘酷的迫害行動。

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沒有立即認識到六月錯誤的全部嚴重性。只是由於共產國際的積極工作，共產黨領導機構中的大多數人才走上了開展廣大的人民運動的正確道路。而國內局勢也正是要求這樣做。廣大的人民絕不願與當果夫的政府相妥協。農民痛恨當果夫的反動政權，並準備為推翻這個

政權而鬥爭。遭受殘酷迫害的工人階級，盼望着共產黨號召他們奮起投入反對資產階級的戰鬥。一九二三年八月，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通過了必須準備實行武裝起義以求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和建立工農政府的決議。共產黨向農民同盟、社會民主黨和激進黨號召建立統一戰綫。同時，共產黨也向馬其頓的民族革命組織，提出了關於建立行動統一的提議。但是，以後它僅僅和農民同盟成立了關於建立統一戰綫的協定，並開始加緊準備實行起義。武裝起義決定於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舉行。

在進行反對反動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是必須發展最廣泛的民主戰綫的，因此共產黨就以推翻常果夫政府和組織民主政府作爲自己首要的目的。當時共產黨提出的基本口號就是：『團結人民的一切力量，爲建立工農政府而鬥爭。』

武裝起義的計劃，原規定全國工農在各地同時採取行動。但是，這個計劃實際上並沒有付諸實現，這主要是由於中央和各地共產黨組織內的機會主義分子，對中央通過的關於實行武裝起義的決議實行怠工。結果，像索菲亞、普洛夫、彼爾尼克和伏拉查等這樣一些最重要的城市，都沒有爆發起義。九月二十一日，政府破獲了索菲亞的革命委員會，未遭逮捕的其他領導人，取消了原定於九月二十二日在索菲亞舉行的起義，這就引起了組織內部的混亂。九月十九日，斯大羅薩哥拉地區爆發了起義。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夜間，保加利亞的西北部、東南部以及全國其他許多地方的勞動人民都舉行了起義。凡是在與農民同盟結成了聯盟的共產黨領導起義的地方，羣衆都是抱着最熱烈的情緒參加戰鬥；凡是共產黨所領導的起義，都具有真正的羣衆性和人民性，都具有工農爲建立民主政權而鬥爭的性質。季米特洛夫和柯拉羅夫所領導的保加利亞西北部的鬥爭，進行得特別猛烈。

經過兩星期的英勇鬥爭以後，起義的工人和農民被擊潰了。保加利亞政府竟對起義的工人和農民實行血腥的鎮壓。當時慘遭殺害的有兩萬人以上，被捕並交付審判的則達五萬多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失敗的保加利亞，在戰爭結束時，已經疲憊不堪了。國內遭到經濟和政治危機。舊有的各政黨都破產了。在國內革命運動日益發展的條件下，農民同盟和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影響增長了。

執政達數年之久的農民同盟政府，進行了反對共產黨人 and 大資產階級的鬥爭。由於斯丹波里斯基的政策和共產黨的錯誤，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產生了分裂，這便有利於資產階級反革命集團準備和發動法西斯政變（一九二三年六月九日）。政變後建立的常果夫法西斯政權，是廣大人民所痛恨的。工人和農民遭受到殘暴的迫害，他們盼望着共產黨發出進行反對共同敵人的鬥爭的號召。共產黨通過了關於準備武裝起義的決議。爲了進行推翻常果夫政府而成立民主政府的共同鬥爭，共產黨和農民同盟締結了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協定。

一九二三年間共產黨所組織的九月起義，被鎮壓下去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起義之遭受失敗，首先是由於黨的某些領導人沒有剷除『六月九日的』機會主義觀點。因此，黨的某些領導人甚至對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實行怠工。共產黨中央在準備武裝起義時，並沒有進行反對機會主義分子的充分鬥爭，也沒有把機會主義分子從黨的領導機關內部清洗出去。某些機會主義分子的怠工行爲，阻礙了各大城市的無產階級充分地進行鬥爭。在起義者中，農民佔了多數。

此外，起義並不是同時在全國所有最重要各地區同時爆發的，各起義地區之間的聯系被切斷了，國內最大的工業中心城市沒有起義。這種種情形使政府得以對各地的起義實行各個擊破。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審判的發言中，曾指出一九二三年九月起義失敗的基本原因：

『我很惋惜……我和我的黨當時還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因此，我們未能成功地組織和進行這一以無產階級爲首的歷史性的人民起義。』

我們的組織之未能充分實現布爾什維克化，我們所採取的政策與策略，我們之缺乏革命經驗，而特別是我們的機會主義的所謂六月九日的中立立場，實大有助於保加利亞的……竊國大盜去鎮壓羣衆的起義。』

領導九月起義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雖然在準備和實行武裝起義中犯了這些錯誤，但仍然贏得了羣衆的信任。起義行動把共產黨和人民密切地聯系起來。因此，九月起義促使保加利亞共產黨變成爲真正羣衆性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

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九年時期的保加利亞

常可夫的法西斯政權

常可夫政府在一九二三年九月擊潰了革命的工農起義之後，就採取了鞏固金融資本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方針。它把根據『勞動土地所有制法』從地主手中沒收的土地，還給了地主，取消了農民同盟政府的土地改革，即剝奪了農業合作社在農民同盟政府時期取得的那些權利。房主達到了取消『關於住宅需要』的法規的目的。政府和工廠主廢止了一切有關勞動保護的法規，從而取消了工人多年來經過鬥爭而取得的一切成果。對工人和農民的剝削也越發加強了。共產黨被迫轉入秘密狀態，一九二四年，共產黨被宣佈是非法的。

但是，所有這些措施並沒有造成資本主義的穩定局面。原始的粗作農業和廣大居民羣衆的極其低微的購買力，大大地阻礙了資本主義穩定局面的恢復。在對外貿易方面是輸入超過輸出。政府以外債和租讓方式使國家遭受奴役的政策，使勞動羣衆的狀況受到極惡劣的影響。租讓制——特別在農業中的租讓制——只不過是幫助外國資本家來榨取人民的財富的。某些工業部門完全地或主要地由外國資本經營，並爲外國大資本家及其保加利亞的夥計的利益而工作。電氣工業、五金加工製造業、製糖工

業、製鹽業等都屬於這一類的工業部門。

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反動陣營，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農民和不滿意大資本家享有各種特權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這兩者之間在國內鬥爭的尖銳化，就是當時局勢所造成的後果。

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國會大選中，工農聯盟的候選人（其中有三人是共產黨員），都當選了。選舉的結果證明：常可夫政府是不穩定的，勞動大眾是跟着共產黨和農民同盟走的。政府對選舉的結果感到恐慌，因而更加殘暴地迫害革命的工人和農民。工人的代表被逐出國會。政府通過了許多的結果感到恐慌，並以吸收資產階級青年和破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方式來擴大各種反動的組織。警察機構也加強了。政府取消了工人和農民的公開的、政治的、職工會的和合作社的組織，並查禁了它們的一切刊物。工人和農民進行公開鬥爭的任何機會都被消滅了。『國家保安法』上又補充了規定對『危險分子』處以死刑的新條文。

在喬爾吉也夫將軍安葬時，各部部长、國會議員和著名的政治人物齊集於索非亞大教堂。大教堂內突然發生了爆炸事件（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這一挑釁性事件發生以後，迫害活動就達到了頂點。

爆炸事件成了宣佈軍事狀態和加強反對人民羣衆的白色恐怖的便當藉口。數萬人被捕了；由軍官聯盟和各種反動組織的代表所組成的秘密『會議』，不經過審判和偵訊，就槍決了數千革命的工人和農民，其主要的打擊目標是指向共產黨和農民同盟左翼的擁護者。

政府沒有能够成立自己的組織來代替被它解散的職工會。在鎮壓工農以後，不到三四個月，保加

利亞的工人就不顧恐怖的威脅，而着手恢復自己階級的職工會組織。一九二五年七月底和八月間，索非亞及各省就成立了印刷工人、縫衣工人、皮革工人和其他各種職業的工人的獨立的『協會』。

共產黨也同樣恢復了自己的隊伍，並在工人、農民和獨立的職工會中，進行了巨大的工作。

廣大羣衆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把常可夫政府在國內的那種微不足道の影響，破壞無餘。而短時期曾爲煽惑性的諾言所誘惑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也都改變了對常可夫政府的態度。統治陣營中產生了各種矛盾，這使各資產階級政黨陷於分裂。除了國民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以外，所有資產階級政黨都加入了『民主協商』。在鎮壓了工農的革命起義之後，『民主協商』內部代表互相矛盾的經濟利益的各種政治派別之間，展開了尖銳的鬥爭。鬥爭主要是在政變時期組成資產階級戰鬥隊伍的各派別和參加了『民主協商』這個組織的舊有各資產階級政黨之間進行着。

代表富農、房主、高級官吏、軍官、一部分大商人和銀行資本家利益的國民自由黨，也分裂了。這個黨的右派基本上同意執政黨的各種觀點。民主黨也分裂了。憑藉城鄉的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的民主黨左翼，退出了『民主協商』，並力求由各個『忠實的』政黨建立一個大聯合。激進黨的左翼，同樣也退出了『民主協商』。在農民同盟中，也產生了分裂的現象，它的右翼主張與資產階級聯合。

在有關此後的策略這個問題上，社會民主黨內部展開了鬥爭。這個黨的一個領袖卡查索夫參加常可夫政府的事實，使社會民主黨喪失了它在羣衆中的威信。一九二四年，社會民主黨決定退出政府。以前部長卡查索夫爲首的一部分領袖，與社會民主黨決裂，而組成社會主義同盟。這個組織是支持反